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1.019

日据末期台湾作家日语写作的 反殖民书写策略

林娟芳¹,刘小新²

(1.福建社会科学院 海峡文化研究中心;2.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日据末期台湾作家运用殖民者语言,策略性地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言说世界,挑战殖民者的文化霸权;挪用写作权力来反思殖民当局近代化论述的破绽、重新体认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台湾作家从“被动”生产的小说文本,敷衍殖民当局的文艺统制政策,转为书写回归乡土、民俗传统与歌颂劳动之美。那种认为台湾作家已经屈服于殖民当局的研究观点并不正确,应该正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反殖民文学书写中的作用。

关键词:日据末期;语言重置;反殖民;殖民者的语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1-0141-07

日据末期台湾文学研究一直是东亚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国内外学界在日据末期台湾文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研究史观的问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尾崎秀树从压迫与抵抗的视角去认识和研究日据末期台湾文学,这种以反省日本帝国殖民主义立场为主的学术研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对殖民主义批判和对被压迫民族之反抗斗争的关注让位于“学术”的制度、文化、媒体、市场等研究^①,与台湾岛内90年代以来极端本土论者虚构的台湾民族论意识形态遥相呼应。其二,语言问题导致研究不全面。祖国大陆学者对日据末期的文学尤其是日语写作部分研究很少,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不够全面。其三,日语写作的价值没有得到客观评价。进入21世纪以来,以垂水千惠、星名宏修、和泉司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相关研究往往把台湾作家的日语写作置于所谓以标准日语为参照的体系中,视其为有缺陷的日语。

尾崎秀树曾指出:“这一切不能用自己民族的语言,而只能用统治者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处理方式,我想其本身就包含着殖民地文学的重

大课题。”^②本文将在“文化抵抗”的视角下,研究日据末期(1937—1945)台湾作家日语创作抵抗殖民的写作策略。一方面从宏观角度还原日据末期台湾文坛的生态。借鉴后殖民的语言重置等方法论,分析台湾作家如何通过改写殖民者的语言建构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言说世界。另一方面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重新阐释日据末期台湾作家在文艺统制政策下“被动”生产的小说文本中隐藏的抵抗殖民精神。从而修正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知识生产中被遮蔽、被误读的地方,补足对日据末期台湾文学内部观察和细部分析的不足,批驳日本学界对台湾作家日语书写的误解和偏见。

一 日据末期台湾文学场域

语言是人类的表达工具和认识外部世界的媒介,同时与国家、民族紧密联系,具有厚重的象征意义。日据时期,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在台湾施行以日语教育为中心的同化政策,高度模仿日本近代国家统合模式,其目的在于不断磨灭台湾人原本的民族属性,妄图把台湾人改造成日本人,以获取殖民统治所觊觎的各项利益。1936年9月,

收稿日期:2022-09-25

作者简介:林娟芳(1985—),女,福建福州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台湾文学、翻译研究。

①赵京华:《殖民历史的叙述方法与文化政治——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②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陆平舟等译,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小林跻造被任命为新一任台湾总督,上任之际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化”三大治台方针,在台湾开展“皇民化运动”。殖民当局对待汉字汉文的态度从最初的怀柔政策转向激进,1937年4月下令废止汉文栏,汉文被驱逐出公共场合,台湾新文学遭受重创。

1940年7月第二次日本近卫内阁成立后发起“新体制运动”,殖民当局改变过去禁压的文化政策,《文艺台湾》《台湾》《台湾艺术》等杂志相继创办,台湾文艺界一时复苏。1941年初殖民当局出台相关政策,文化部门的管辖范围大幅扩大,不断收编文化活动。为了配合战时动员,1943年4月,殖民当局成立“台湾文学奉公会”。这是日据末期台湾唯一的文化主管部门,几乎掌管所有文化工作,整个台湾文学界都被纳入日本军国主义控制的一元体系下。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台湾文坛遭到更彻底的统制与围剿。1943年11月13日,“台湾文学奉公会”在台北召开“台湾决战文学会议”,殖民当局强调了文学作为思想战武器的重要性和文学者的责任。西川满提议将《文艺台湾》杂志献给“台湾文学奉公会”^①,这直接导致《文艺台湾》《台湾文学》《台湾》《原生林》等杂志被合并,台湾岛内的六家报纸也相继被统合,台湾文坛加速式微。1944年3月,“台湾文学奉公会”发起“台湾文学界总崛起”运动。“总督府”情报课作为行政机构,直接出面要求“皇民奉公会”制定计划派遣作家奔赴台湾各地第一线探访并撰写报告文学。至此,台湾文学主体性完全被剥夺,殖民当局极端地收编文化,日本殖民统治进入至暗时刻。

二 逆写帝国:语言重置和文本重置

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语言政策,日据末期台湾作家的文学创作主要以殖民宗主国语言日语为主。后殖民主义理论十分关注语言问题,尤其关注作家在写作中对殖民宗主国语言的抵抗和挪用。研究者指出,殖民地作家对殖民宗主国语言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弃用和挪用,即“语言重置”。这是一个获得并重塑语言新用途的过程,它标志这一语言脱离了殖民优势的地位^②。这为理解日据末期台湾作家日语写作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参考。日据末期台湾作家面对殖民宗主国语言日语的强势地位,通过“语言重置”策略与日语指涉的日本文化传统持续斡旋,积极运用日语的工具性探索抗衡日本殖民当局文艺政策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包括注解、语言颠覆、语言变形的转喻作用、典故和差异等。

首先,常见的策略之一是日语文本中直接使用汉语词汇并运用括号添加意译或者直译注解。例如张文环小说《阉鸡》中“タウケエ(委員)”“頭家(处方箋)”等表达方式,龙瑛宗在《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獭》等作品中直接使用停子脚、土角、聘金、出草、过房子等汉语词汇并用括号添加注释。这是台湾作家从自身文化位置出发,有意在文本中植入“静默的间隙”,括号的应用凸显并隐秘地记录下文化差距的持续现状。

其次,文本中运用未经翻译的汉语词汇表达台湾民间生活独有的文化概念。这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例如张文环的《论语与鸡》《夜猿》《阉鸡》等小说运用植入具有强烈个性的“鑼鼓陣”“有心公”“授書”“早學”“車鼓姐”等词汇,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言说世界。这些词汇的指涉对日本人而言都是陌生的,脱离了“正确且标准的日语”的范畴,是对殖民当局妄图铲除台湾人的中华文化根基及其深厚的文化习惯的挑战和解构。

再次,在日语写作中植入俗语或者闽南语音译也是常见的语言重置策略。日据末期日语被殖民当局赋予绝对的优势地位,闽南语等其他方言则被贬低,但台湾作家反其道而行,以此挑战殖民者的价值偏见。例如张文环在《夜猿》《阉鸡》等小说中不使用日语固有的表记方式而使用“苦鷄母”“きんぬきとり”等俗语词汇,且在人物对话和非对话叙述中区别标注闽南话的音译和日语音读。这种做法并非个例。其他小说文本中也有“クアン動カアン”(《夜猿》),“たんにい”“フェラン”(《地方生活》)等闽南语音译的词汇出现。再如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ずぼん”“おんな”等表达方式也是同样的运思。台湾作家策略性地凸显了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差异,不同文化经验得以在文本中

^①西川满:《文艺杂志的战斗配置》,《文艺台湾》(台北)1944年第1期,第47页。

^②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留下烙印,也有意无意地表达了对日语特权的反动和防御。

最后,在日语文本中直接引用中华典籍原文也是台湾作家常用的策略。日本人一般借用汉字的形和义即采用训读的方式学习中国的古文。日据末期,张文环、吕赫若的小说直接引用儒家经典原文,这与日本式的训读方法不仅仅是原文韵律上的差别,更是语言和文化意识的差别,体现了作家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台湾作家多样化的挪用策略挑战和破坏日语的规范性和特权性,凸显台湾人民与殖民宗主国充满差异的文化经验,建构了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言说世界。

正如《逆写帝国》指出:“在后殖民话语中具有最深刻意义的挪用却在于写作本身。通过对写作权力的挪用,后殖民话语抓住了强加于己的边缘性,使杂糅性和融合性成为再定义文学和文化的依据。”^①后殖民理论把这种写作方式称为“文本重置”,关注的是作家对写作过程的掌控。日据末期台湾作家通过挪用写作权力,反思殖民当局近代化论述的破绽、重新体认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写作方式与殖民当局文艺政策错位和失焦,重新定义了文学,成为“日语文学”的异端。

张文环在日据末期的一系列作品,着眼于传统汉文教养对台湾文化基础的重要作用。作品中的台湾青年赴日留学后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重新思考殖民者所标榜的现代化问题的逻辑破绽,回到故乡开始反思质疑现代教育的功利性及在个人道德培养方面的缺失,重新认识传统汉文教育的意义,寻求台湾文化的根本和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最终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张文环曾指出日本的学校教育其实是“只为颁授职业上的许可证而缺乏真正教导做人的教育”^②,即偏重知识和职业技能的传授疏忽道德观念的教育。《地方生活》的主人公泽在东京完成学业,回乡后意识到道德教养很难通过学校教育获取,开始反思学校教育并对近代教养主义观念性产生怀疑。《土地的香味》主人公清辉反思现代教育疏于陶冶人格,怀想昔日的书房教育,探索知识分子

在殖民地社会如何实现现代教育与传统汉学的融合。

“东洋论述”是日据末期日本借以合理化侵略战争和战争动员的言说策略之一。相较于殖民当局把东洋论述的核心置于“日本”,台湾作家的东洋观则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心。“东洋论述”成为台湾作家可以挪用和重置的资源,由此产生的创作也与以日本传统为中心的论述产生偏离。吕赫若曾在日记中写道“研究中国非为学问而是我的义务,是要知道自己。想写回归东洋、立足于东洋的自觉的作品”^③。其长期思索的东洋问题的逻辑是:研究中国是自己的义务,创作立足于东洋自觉上即立足于对中华文化深刻理解基础上的作品,深度挖掘潜藏于台湾风土民俗中的故事,客观记录传统家庭各种复杂的样貌且不予以价值的评判。但吕赫若没有停留于平板化的描述,而是将自己的“感觉和看法”深藏于作品中,记录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生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刻,挖掘沉淀其中的中华民族的伦理情感,以此保留和唤醒民族集体记忆和情感。

其一,对民族特色的传统建筑和文化空间的素描。吕赫若的《财子寿》《合家平安》《玉兰花》采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客观记录早期移民为了在领土开拓竞争中生存下来所建造的典型闽南系移民建筑的风貌。《月夜》详尽描写兼具宗教意义和重要文化象征意义的关帝庙,隐藏着吕赫若对“皇民化运动”浪潮下传统文化走向衰败的深深忧虑。

其二,以民俗传统的书写抗议殖民统治下传统道德人伦的崩坏。博埃默曾指出,一个民族尽管长期受到压制,但其民族性仍然深深地埋藏在文化源头中^④。在中国传统社会,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的人伦要义。小说《石榴》深具民俗学题材的写作特色,依次写了招赘、螟蛉子、合炉、过房等民俗事项,包含着深刻的中华民族认祖归宗和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风水》中除了洗骨的民俗学描写以外,也叙述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传统家风崩坏的一面,传统社会的家庭共同体业已分崩离析。

①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页。

②张文环:《台湾文学的自我批判》,《张文环全集(卷6)随笔集(一)》,陈万益主编,台中县立文化中心2002年版,第68页。

③吕赫若:《吕赫若日记(1942—1944)中译本》,钟瑞芳译,台湾文学馆2004年版,第358页。

④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其三,批判性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在儒家文化中,孝不仅是日常生活中善事父母,也是德之本和仁之本。《清秋》中主人公耀勋对“孝”的理解和坚持贯穿整个故事,是思考和行动的基准。耀勋决定回乡开业却痛苦地意识到医术已沦为商品,这背离了妙术济世的医师人德,也与祖父所勉励的年轻人要有浩然之气冲突。因此,耀勋内心拒绝开业,因为金钱主义下的行医与其所尊崇的中国传统“孝”文化的更深层意蕴相违背。耀勋徘徊于开业与不开业之间,实际上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也反映了作者在皇民化时期以研究中国来获取立足于东洋的精神资源。

三 质疑与批判:“南方书写”中的殖民地青年

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征兵制等一系列包含着使台湾成为军事要塞的实战动员计划,借此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其本质是需要台湾人“作为日本人而死”。殖民当局要求作家进行相关创作以配合动员计划,尾崎秀树曾剖析:“作家们也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允许避开这个主题而从事其他创作。”^①《死于南方》《顿悟》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

《死于南方》中的友人表面上顺应“历史的潮流”前往南方战地做翻译,但现实生活的重压才是友人去南方真实动机。根据研究,台湾“志愿兵”招募的典型为20岁左右农民,而愈是弱势群体愈容易出现被迫报名应征的情况^②。友人前往南方的契机,小说以“巨大的历史变动”一笔带过,作品也回避了对南方生活的具体描绘。如果作者有意顺应配合宣传日本殖民当局政策,此处应对其“内涵和意义”大书特书才对。博埃默指出,帝国本身——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也是一种文本的运作。殖民地官员乃至普通读者都要通过文本来理解殖民化的问题。文本使殖民宗主国的读者能够去想象殖民开发、西方的征服、民族的勇气、新的殖民获取等等^③。日据末期日本作家的“南方书写”投射了帝国扩张的强大欲望。但

《死于南方》中的台湾青年差点孤独病死他乡,这是殖民体制下底层青年的无奈选择,与国家的意志毫无关联。小说的结尾看似赞扬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壮大的一个时代”,爱子的指控却消解了“我”对这个时代的赞扬,充满矛盾和混乱。

关于战争末期殖民地男性的战斗力与劳动力的动员问题,柳书琴曾指出,殖民当局的动员政策宣传往往“强调雄性尊严与男儿本色”,“身份、性别认同与解放,取代战争的真正动机”^④。日据末期,张文环被网罗进“皇民奉公会”,奉命出席各种座谈会,发表了一些与时局相关的随笔、报道。相关言论中,被研究者反复提及的是“身为男子汉,还是要有一次战场的经验”^⑤和“或许本岛人青年大家都会觉得终于确立了作为男性应有的面目吧”^⑥。张文环的相关言论强调男性必须当兵,实则暗示以往台湾人受到歧视。《顿悟》主人公王为德就是非常典型的被动、软弱、阴柔化的男子形象。在人生困顿之时,他听到招募消息便想到“做一个男人应有的作为”于是决定应征。然而,作品后半部分却是王为德用从应征“志愿兵”中获得的“男子汉”气概来处理私人问题,甚至辞职发泄不满。王为德所理解的男子汉气概,与“公的”目的所宣扬的“为了国家和天皇”毫不沾边,他在意的是“私”的层面,这才是他的全部动机。小说中与“国家”相关的叙述仅有“直接对国家有益,才使我的希望燃烧起来”,但是究竟是何益处及与国家有何关系都是空洞的。此处作者或许只是为了敷衍这个题材与时代的叙述,实际上解构了志愿兵“公的”目的。殖民当局试图改造台湾人民将其送上战场为帝国“效忠”,然而对殖民地青年来说,解消个人烦恼才是应征“志愿兵”最大的动机,这也暴露了“皇民化”运动的空洞与不得人心。

四 殖民地民族关系的书写:错综复杂的内与外、实与虚

日本殖民当局为了达到帝国统合和战争动员的目的鼓吹所谓的“民族融合”,要求作家书写殖民地民族关系的“命题作文”,其中殖民者与被殖

①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陆平舟等译,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②近藤正己:《总力战与台湾——日本殖民地的崩溃(上)》,林诗庭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372页。

③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4页。

④柳书琴:《荆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410页。

⑤张文环:《宿营印象记》,《张文环全集(卷6)随笔集(一)》,陈万益主编,台中县立文化中心2002年版,第97页。

⑥张文环:《一群鸽子》,《张文环全集(卷6)随笔集(一)》,陈万益主编,台中县立文化中心2002年版,第103页。

民者间的“友情”“内台通婚”是最常见的题材。

《莲雾的庭院》是龙瑛宗个人文学史上兼具重要性和特殊性的作品,龙瑛宗在战后回忆中将其作为台湾人全部聚齐在《台湾文学》旗帜下的标志。《莲雾的庭院》讲述“我”和藤崎一家交往的往事。藤崎一家是生活困顿的日本底层民众,与同时期日本作家所描绘的承载着帝国扩张领土欲望的“模范”日本人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他们总是很有优越感地流露出对台湾的偏见与误解,有意无意地强调日本人和台湾人的身份差异,潜意识中拼命维护两者之间的壁垒,把生活的挫败感投射到台湾这片土地,实际上是用俗套的方法再现了台湾,其中隐藏着殖民者对被殖民民族的贬斥和蔑视。小说结尾藤崎君说妹妹万里子讨厌“我”,“我”脱口而出:“说是民族啦什么啦,总之,不就是爱情的问题吗?”^①全文仅此处出现“民族”二字,龙瑛宗在南投工作期间被日本人上司羞辱的经历让他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间的不平等关系有清醒的认识。鉴于特殊的时代境遇,作者在文末突兀地提出用“爱情”作为解决方案,但殖民体制下民族差异和不平等依然横亘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终究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再如吕赫若的《玉兰花》。论者一般认为小说中的日本人铃木善兵卫是普通的民众,与殖民的权力无关。笔者认为铃木并非普通的民众,他手中的照相机暗示了他的权力位置。根据小说的叙述,故事发生于1920年左右。20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海外旅游逐渐成为国民休闲生活的一部分。殖民当局积极推介旅游活动,希望日本人到台湾旅游,藉此展示殖民统治的成果。麦肯纳尔德认为旅游环境分为“前台”和“后台”,旅游环境和社会的分化程度互为表里。高度分化的社会往往是被切割成无数专业的小单元,每一个单元向心而封闭,不会任意开放给外人恣意观看,于是会逐渐分化为可被观看的前台和难被人一窥堂奥的后台^②。铃木的旅行方式区别于一般制式而陈腐的“前台”的观赏,而是以旅居者身份来到台湾乡村居住一年多,即涉入“后台”。像铃木这样的旅者,他们脱离了由政治权力制定的官方旅游路线,进入台湾乡野,其扮演的角色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权力的延伸。通过探访寻

找台湾这片土地上尚未被发现的处女地,将再度延伸并扩展台湾可供观看的“前台”,从这种意义来说,他们是“权力延伸的先锋尖兵”。

照相机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与现代化、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话语关联紧密。它不仅仅是一种客观记录的方式,更是权力话语的体现。当摄影者将镜头对准被摄影的人,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两者之间即构成了凝视与被凝视的不对等关系。凝视是带着权力运作和身份意识的观看方法,观者多是“看”的主体,也是权力和欲望的主体,被观者多是“被看”的对象,也是权力的对象。铃木手中的相机就代表着殖民者的凝视,其凝视对象包括小孩、祖母、伯母、母亲等弱者。从照片的人物和布局可知,大都是在预设情景下按照拍照者的要求完成的,这体现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凝视与被凝视的不平等关系。但众多照片中却没有一张是铃木的,这从侧面说明了铃木对照相机的绝对控制权,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绝对权力关系的隐喻。

徐贲曾指出记忆特别与“关爱”相关,记忆不只是知性的记忆,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③。从记忆和关爱的角度来说,我们所关爱的人一定会深深刻在记忆之中。小说中“我”完全忘记小时候为何亲近铃木,他一离开我突然有忘记他容颜之感觉。时至今日“我”却对家族几代人奋斗历程如数家珍。这两者之间不同的记忆形成强烈对比,体现了作者对家族的热爱,也暗示了铃木根本不是“我”所关爱的人,这是台湾人和日本人间无法消弭的隔阂的隐喻。因此,这篇小说表面上呼应了当局号召,实际上是作者对殖民当局审查制度得体而有尊严的应对。

五 “文学增产”动员与抵抗:《决战台湾小说集》的写作策略

《决战台湾小说集》是1944年殖民当局主导的作家派遣计划的报告文学结集,是殖民当局文化收编最极端的表现。其中收录了杨逵的《增产的背后——老丑角的故事》、吕赫若的《风头水尾》、张文环的《在云中》、龙瑛宗的《年轻的海》等报告文学。

①龙瑛宗:《龙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二册 小说集(2)》,陈万益主编,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11页。

②吕绍理:《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麦田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③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在《增产的背后——老丑角的故事》中,杨逵无法直接反对或者批判“国家的意志”,但依然忠诚于普罗文学家的使命,通过描述矿坑中危险的劳动场面,再现了作为“增产战士”的矿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窘迫。杨逵有感于矿工们努力工作的场面,发自内心地敬重劳动者,反省知识分子的不足。杨逵还通过《模范矿工》被禁演的细节,暗示了严苛的检阅制度,也质疑殖民当局把艺术活动收编成为政宣的工具,批判与工人绝缘的派遣计划。或许是为了应付当局的要求,作品结尾不断复制“增产报国”的口号,但又以自我指涉的方式暗示这是捏造的。

在派遣计划中,吕赫若被派往台中州下谢庆农场参访。谢庆在日据时期经济优渥、社会地位优越,是当局要笼络和利用的殖民施政工具。1942年至1944年,谢庆相继获得“皇民奉公会”的“产业战士”表彰、耕地防风林部个人奖及台中州农会奖,并获评全岛劳动者模范者^①。1942年,其专访文章《与土地的斗争》刊登于具有强烈官方色彩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宣传机器《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文章把谢庆从事粮食生产的经营行为与“增产报国”的时代叙述相呼应,是典型的战争宣传产物。《风头水尾》与其在若干情节上高度吻合,但细节差异中所蕴含的“抵抗”运思不可忽视。专访文章中谢庆身着“国防服”,《风头水尾》中洪天福则身着被视为敌性的服装“一身朴素的台湾衫”,其中隐藏着吕赫若淡化洪天福与时局联系的苦心。《风头水尾》没有宣传增产政策,把殖民当局和地主放在次要位置,更关注是农人艰辛的劳动。吕赫若在从军作家座谈会上揭露农民不堪重负的现状,提出必须给予农民适当的援助,足以体现其关怀农工的倾向。尽管身处日本殖民统治的至暗时刻,吕赫若依然满怀信心憧憬光明未来,小说结尾农民徐华的笑容象征着台湾人民与恶劣环境搏斗的乐观精神和反抗殖民统治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云中》是张文环被派往太平山体验伐木工人的“增产生活”后被迫完成的。张文环选择性地关注和书写他所惯用的女性叙述,模糊了焦点,本

应有的主角“产业战士”被抽离,主人公阿秀的自我和解暗示台湾人面对困境的勇气与决心。小说主题回避了情报课所期待的“增产报国”主题,所谓“增产”的场面只留下轰鸣的机器声和树木倒下时悲壮的场景。张文环在从军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明显可见其“言”与“文”的差异,他无限痛惜千年参天古木被砍倒,并批判罪恶的日本侵略战争摧毁了千年古木所代表的古老文化。日据末期,殖民当局使用一套具有拟物化、具美丽浪漫色彩及升华和超越性的修饰性说辞,给兵役和战争涂上一层浪漫、荣耀、甚至超越的色彩^②。但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多次出现“死”或“战死”的表达,张文环通过工人之口揭露了殖民地青年人的血肉之躯即将变成炮灰的残酷真相,在玩笑和戏谑之中传达出殖民地人民的悲哀和痛楚。

在派遣计划中,龙瑛宗是唯一被派往军事训练所的作家,参访高雄海兵团后写下《年轻的海》。1943年5月,日本军国主义在走向穷途末路时为鼓动无辜的青年走向战场,相继出版了相关宣传读本。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法西斯美学来蒙蔽民众,煽动社会全体卷入战争。所谓法西斯美学,一般指透过“美”“崇高”“道德”等形象,进行所有生活的艺术化,来达到大众动员的文化策略^③。日本军国主义主要通过传统再造、美学化、象征误识三种机制,把军国主义及其象征美学化,使被殖民民族接受其特定价值和意义^④。例如1944年台湾公论社出版的宣传读物《海军与台湾青年》、日本作家丸井妙子参访高雄海兵团后撰写的报告文学《高雄海兵团》与《绯樱记》,都运用樱花飘散时唯美浪漫的意象遮蔽了战争惨烈的阵亡场面,把军事行动美学化,具有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美学特征。军国主义美学化的机制在海兵训练教育中也可一窥端倪。根据相关宣传读物记录,海兵训练教育包括学课和军事训练,学课中的历史教育侧重于日本历史,其中使用“传统再造”机制建构天皇形象,并将其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加以传播,借此强化灌输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并在日常军事训练中加以重复和加强。

①林娟芳:《“文学增产”动员与抵抗:〈决战台湾小说集〉》,《台湾研究集刊》2022年第3期。

②林娟芳:《“文学增产”动员与抵抗:〈决战台湾小说集〉》,《台湾研究集刊》2022年第3期。

③崔末顺:《海岛与半岛:日据台韩文学比较》,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303页。

④大贯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石峰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99—305页,第329—342页。

相较于这些法西斯美学化的相关文本,龙瑛宗的《年轻的海》选择性地记录了两个青年拼搏忍耐的训练场面,甚至大篇幅描写两个青年温情的生活化场景,通篇不见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可见作者有意摆脱消解政治化写作的约束和侵蚀。此时期龙瑛宗已被网罗进“战时思想文化委员会”,无法正面抗拒当局的写作要求,作品最后以森川在梦里想要成为一等水兵的情节敷衍搪塞动员要求,但其想要好好干也只不过是一句梦话。这也可在龙瑛宗的战后回忆中得到印证,殖民当局动员的目的是“煽惑本省青年,为圣战加倍出力”,但是小说结尾“本省人为天皇捐躯是说梦话”^①。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借鉴后殖民理论中所吸纳的

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语言重置”和“文本重置”等方法论,从文化抵抗的视角较全面考察台湾作家在日据末期运用殖民宗主国语言日语进行抵抗殖民的文学书写策略。通过细读原始日语文本可以看出,台湾作家敷衍殖民当局的文艺统制政策,书写回归乡土、民俗传统与歌颂劳动之美,具有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从而批驳了以往研究认为台湾作家已经屈服于殖民当局的论述,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抵抗殖民统治文学书写中的作用。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日据末期的台湾反殖民文学叙事中的作用,是全面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抗日书写的有益补充,也有助于提炼一种以中华民族自身为主体的、抵抗侵略的、追求民族独立自由的、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叙事与思想。

On Taiwan Writers' Anti-colonial Writing Strategies in Japanese Writing at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LIN Juan-fang¹ & LIU Xiao-xin²

(1. Strait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350001, China;

2.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ost colonial theory, this paper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use of colonial language by Taiwan writers at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o strategically construct a speaking world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hallenge the colonial cultural hegemony, i.e. misappropriate the writing power, reflect on the flaws of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discourse on modernization, and re-recognize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novel texts produced by Taiwan writers have “passively” perfunctorily interpreted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rol policies of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and turned to writing about returning to the local, folk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nd eulogizing the beauty of labor. It refutes previous studies that Taiwan writers have succumbed to colonial authorities' statements, and clarifies the role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nti-colonial literature writing.

Key words: the en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language reset; anti-colony; the language of the colonist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龙瑛宗:《龙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七册 随笔集(2)》,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44页。